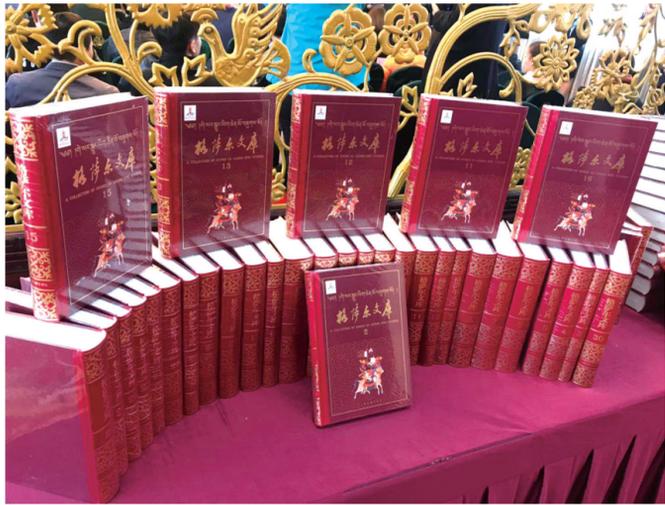


《格萨尔文库》出版发布及捐赠仪式在京举行

本报讯(记者 明江)3月29日,《格萨尔文库》出版发布及捐赠仪式在京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党组书记、主任巴特爾出席活动并讲话。

《格萨尔》作为一部伟大的英雄史诗,是世界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贡献。此次出版的《格萨尔文库》含多民族、多语种的三卷30册约2500万字,由国家民委所属西北民族大学几代学人辛勤耕耘、呕心沥血20余载完成,集搜集、整理、翻译、研究于一体,在科学梳理和划分的基础上,对《格萨尔》史诗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整理与研究。

巴特爾在讲话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及《格萨尔王》等少数民族史诗,推动了包括少数民族文化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格萨尔文库》是《格萨尔》研究标志性成果和集大成之作,其编纂过程对于传承经典、培养人才、联合攻关、积累经验等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出版《格萨尔文库》既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重大部署的体现,也是坚定文化自信、强化文化认同的具体体现,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举措。



《格萨尔文库》的出版,是新时代《格萨尔》研究的一个新起点。西北民族大学等民族院校和《格萨尔》史诗研究单位等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做好史诗的整理、研究和传承发展,把这套《格萨尔文库》利用好、推广好,共同传承保护这一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挥其应有价值和作用,在阐发、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再现新成果,再创新辉煌。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哲部主任朝戈金、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跃进、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安平秋、西北民族大学校长赵德安、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高克勤、四川大学教授曹顺庆6位专家,对编纂、出版《格萨尔文库》的价值和意义进行了阐述。

据介绍,《格萨尔文库》的出版,使格萨尔研究文献资料价值大大增强。一是

发掘整理了藏族《格萨尔》早期珍藏版本,并进行了科学梳理和划分。《文库》一卷藏族《格萨尔》以不含现代艺人唱本为原则,选取了传统《格萨尔》经典版本,涵盖了《格萨尔》史诗的全部内容,展现了《格萨尔》的全貌。二是增加了藏、蒙古等多民族异本资料,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格萨尔》(斯)版本。三是忠实记录了土族、裕固族《格萨尔》的珍贵史料。《文库》第三卷土族、裕固族《格萨尔》,是第一本用国际音标严格、忠实记录《格萨尔》说唱原文的部本。此外,《文库》对藏族《格萨尔》中的92首曲谱(“阿达拉姆”38首、民间50首、新创4首)进行了搜集和整理。

与会专家学者表示,《文库》的编纂出版本身就是多民族文化一体的认识在学术研究中的鲜明体现,《文库》首次出现藏族、蒙古族、土族、裕固族等四种民族语言、文字和汉文对照本,以及在几百本木刻本、手抄本文献中选取的情节连贯的、不含现代艺人演唱的经典本,对于丰富和完善《格萨尔》英雄史诗、促进格萨尔学研究和推动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活动中,西北民族大学为中国国家图书馆、民族文化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自治区社科院、青海省《格萨尔》史诗研究所、内蒙古自治区格斯尔工作办公室等单位赠书。

创作谈

我的中篇小说《包·哈斯三回科右中旗》刊发于《人民文学》2019年第4期,聚焦的是草原地区的脱贫攻坚故事。

科右中旗(科右中旗)对于我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熟悉是因为,几十年来在我生活工作的周边,一直有着科尔沁蒙古族朋友存在,包括单位同事、草原上的牧民、写作者、歌者和摄影家、画家以及诸多周边机关的公务员。他们汉语讲得好,名字的前面往往像我这篇中篇小说的主人公·哈斯一样带着姓氏,也有人用了汉文名字。我不敢说十分了解他们,但一旦接触起来,我马上就能知道他们来自哪里。我之所以亲近他们,是因为我发现他们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共同点,那就是爱草原如命。

我的好兄弟包虎,是我们单位的司机,上世纪70年代从科尔沁草原来到呼伦贝尔,在巴尔虎草原放牧过800匹马的马群。他慈祥的老母亲虔诚信佛,他也是满心怜悯和厚道,嘴上常常挂着“可怜哪……”这三个字,不论是一只受伤的银鸥,还是一朵被践踏的野花,都能触动他的恻隐之心,最令他伤心的事情是草场沙化。我已经记不清多少次坐着他的车在草原和森林里穿行,但是我记住了每一次出行时我们的谈话。他的荒野知识全部来源于实践,他的游牧文化理念是出自骨子里的。我总是洗耳恭听,他总是侃侃而谈。呼伦贝尔地广人稀,我们走得辛苦,但是他不知疲倦,一谈起往日的草原,一谈起大自然养育的牧民,便渐渐豪迈起来,像换了个人似的。我听过很多人唱《诺恩吉雅》这首科尔沁民歌,只是觉得好听,但是听包虎唱,我受不了,总是抑制不住流泪。他的音色并不亮丽,气息常常跟不上,但是他的歌声中有深深的忧伤,有地道的蒙古男人的情怀,一下子就把你带到那长长的缓缓的老哈河畔——只有那孤独的老马拖着缰绳徘徊,美丽的姑娘已经出嫁,只给惆怅的张望留下一个空旷……只有心里深埋着别离的人才能唱出这种意境。

我的老哥哥巴特爾,是上世纪50年代随父母从科尔沁草原来到呼伦贝尔草原的。科尔沁在他的血液里,呼伦贝尔在他的心里,听说我要写一写他几十年传承马鞍制作技艺的事情,便郑重地穿上蒙古袍,向我讲述了一辈子秘不示人的人生故事。我发现草原上的事儿没有他不知道的,他是草原生态的见证人,也是草原历史的见证人,草原的故事和细节已经长在了他的身上。他总是说:“我回来对了,遇到了好领导,遇到了好师傅。”你听,他说是回来,而不是来。呼伦贝尔对于科尔沁草原上的哈斯尔后来说,是永恒的故乡,自幼就有人告诉他们:这个世界上有一条额尔古纳河,河两岸的山林草原,是蒙古祖地,咱们就来自那里。那么对于我哥哥巴特爾这样身世的人来说,科尔沁则是一块留存着亲情和童年的地方。

就这样,呼伦贝尔和科尔沁血肉相连。科右中旗地处科尔沁草原腹地,是全国蒙古族人口最集中的地方之一,这里传统的蒙古族文化氛围十分浓郁。由于历史的原因,科右中旗成了特困旗,现在是中宣部和内蒙古党委宣传部、内蒙古文联的定点扶贫对象。我来到科右中旗,第一个印象就是到处生机勃勃,每一个行业系统、每一个苏木嘎查、每一个家庭都在想办法致富;每一个有志气的人,都在为家乡的将来做着实实在在的事情。如果想写一篇通讯报道,素材俯拾皆是——有50多岁的女人大主任白晶莹,义务组织全旗贫困妇女恢复传统刺绣;有入驻到各个嘎查的青年扶贫干部团队,夜以继日地为农牧民排忧解难、出谋划策;有为了在盐碱地种水稻一天打100多个电话求助求助的第一书记韩军;有在庭院经济中获益的村民;有从放羊改行养猪的牧民……生活在变,人的精神总体是奋发图强的,并没有见到某些小说中出现的那种凋敝景象。同时,科右中旗的致富之路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其思维和操作都呈现出鲜明的本土文化特色。例如,传统的牧马业在高端经营的影响冲击下,并没有垮掉,反而有了新的举措和生机;乌力古尔、科尔沁民歌、传统的四胡制作、安代舞都在推陈出新……这使我想起了蒙古族的古老谚语——雄鹰飞在天上,影子落在地上——当一个民族向前走的时候,其文化底蕴的力量不可低估,那不仅仅是影子一样的外在色彩,还是大树根基下的湿润。然而,我当时捕捉到的只能说是生活中的一个散碎亮点,我想要的适合写小说的故事和细节并没有出现。老朋友岳晓青一直在辛苦地陪我采访,她说,真愁死了,可怎么写啊?我不作声,心里想,我要是有一根针就好了,一定能把这些散碎的亮点穿起来,穿成一条光彩夺目的项链。

到了夏天,我也没想到这根针到底是什么,以致一连否定了几个构思,用一句网络语——郁闷到几乎怀疑人生。我咋就那么笨呢?这时我的外孙女从上海来到呼伦贝尔避暑,我每天再也不敢想这件事了,因为我开车常常溜号,看着红灯没看见一样,直接往前开。

直到年底安静下来以后,有一天我突然心头一亮。我想到,如果去科右中旗的不是我,而是巴特爾哥哥或者包虎兄弟,那么会是一种怎样的情景呢?让他们带着记忆、情感和希望,去触摸去对接眼前的一切,一定会精彩发生!后来我选择让年迈的巴特爾哥哥来成就这个故事,相比之下,他年龄大,一举一动都是历史,都是文化,他更加从容。正如小说里说的那样:一个人年龄到了,什么都经历过了,就没有慌张了。或许是巴特爾哥哥在我的精神世界里特别清晰,小到他上马时的架势,大到他一辈子跌宕起伏的故事,于是我有自信,决定用一个遥远的记忆来脱胎换骨的生活,努力把一段生死离别的故事写得沉稳而诗意。当然,这绝不意味着包·哈斯可以和我的老哥哥巴特爾合二为一,事实上,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倒是常常猛然觉得包·哈斯就是我自己。当然,阿妈、姐姐有时也是我自己。作为一个呼伦贝尔的女儿,草原已经浸透了我。

从前写散文,我习惯炼意、炼句、炼字,本能地抵制叙事倾向,有时候会强迫自己,每篇文章只写一个细节;写纪实文学,我生怕出现失真的事实,为的是经得起现实的诘问和历史的检验,因此时时如履薄冰。这次写小说,想象力充盈,好像脱缰之马,终于跑起来了。虽然还有点胆怯,但是感觉还是挺爽的。

文化是大树根基下的湿润

艾平

实际上,在数字化传播环境里,各民族诗歌的“民族性”其实又进入到了更大层面的“复合”,即以文学性为外在表征的,融地方性、民族性、个人性建构为一体的交融。例如,广西的林白、许雪萍、黄芳、陆辉艳、羽微微等各民族女性诗人,她们的写作常以“个人性”呈现为主轴,并不特别指向“地方性”或“民族性”表征,却又较好地得时代文化、民族文化、地理文化资源进行对接渗透。

总之,“民族性”的适度调整,是时代环境变化的正常反映,是诗歌文本本身进步的必须,也有传播环境的客观原因。数字化传播环境带来了“多元、开放、共享”的文化氛围,促进了民族性表达的更新激活。

少数民族诗歌的“个人性”进一步凸现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生活变动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青年诗人异地求学、生活、工作、创业,与他人的耽于原地、祖辈的圈子化人生有所不同,他们对于民族文化传统的体悟与对现实文化环境的解读,自然有所变化,也更具现时性与时代感。换言之,与数字化传播环境共同成长的年轻一代少数民族诗人对地域文化、民族文化、传统文化的接收、认识、整合与融汇,仍有着与生俱来的优势与独特性,在对外部世界的多维审视中,他们亦拥有对本土经验再辨识与重塑的自觉,这使他们的创作在“地方性”和“民族性”的基础上,为“个人性”的生成提供了可能。

一个地区、一个群体的诗歌创作面貌,终究要落实到个体的努力实践与创新成效上来。其实,当我们谈及少数民族诗歌的发展,也是希望诗人能够在共性条件、共享资源之背景下,在融入现代文化的同时也保持着独特的民族文化内质,在诗歌中维护着民族文化的纯洁与尊严。正如“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他们的“个人性”实践,本身就具备了特别价值和参照意义,对“民族文学”概念更是一种积极的丰富和充实。

提倡“个人性”,这似乎是一个老话题,却也常说常新。一个诗人的成长记忆、民族身份、乡土痕迹、文化情结等类似“胎记”,无论是汉族或少数民族的诗歌表达,最后的基点必然是作者本人——他对观念、信息的处理,对本土、对文学、对诗歌文化生态的高度认识与融会贯通,以及在“想象的共同体”基础上对“差异性”的把握。这最终会体现在诗歌的个性上。

就几届鲁迅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之诗歌奖作品以及一些成绩斐然的少数民族诗人的写作来看,他们可以在当代物质环境与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环境中自如游走,亦能从容地将少数民族文化、汉文化和外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合为创新型营养。同时我们还看到,优秀的少数民族诗人个体,通常也是问题的主动解决者,通常都会“跨界”式创新,并对某些来自“他者”的固态的阅读期待、对“少数民族诗歌”的模式印象有所改变甚至是颠覆,譬如沈苇、大解、娜夜、何小竹等诗人,他们的诗艺探索,实质上超越了“少数民族诗歌”的范畴。

优秀的写作个体通常具有与众不同的视野与胸怀,这意味着他们具有强大的自我改造和自觉革新的能力。他们对地方与民族文化馈赠的回望与持续审视,也是一种深度的自我思索和追问,这种融“个人、地方、民族、时代”为一体的辩证写作,要妥善整合多元多样文化,揭示历史与当下生活的艺术真相,捕捉其本质、变化与复杂性。

总之,传播环境的变化并不能完全决定诗人与诗歌的生命力。无论传播如何变化,在坚持并更新民族性、地方性精神的同时,写作个体的完善始终是关键。在不断与传统对话、与历史对应、与现时对接的同时,相信更多的少数民族诗人会在创作实践中更上一层楼。



新世纪以来,随着数字化环境的逐渐成熟,中国少数民族诗歌在宽敞的传播时空里自在而激情地涌现,诗歌的创作、交流、传播的内涵与形式也逐步嬗变。各民族诗歌应时而茁状成长,创作的多样化和民族性追求不断进步。在这动态的进程中,积极因素与负面作用共存,多民族诗歌文化生态平添新的变化与构建可能。

少数民族诗歌变得更具多样性

数字化传播环境对于中国文学及诗歌的共性作用有目共睹,就少数民族诗歌进程而言,跨地区的互动进一步改变了地理制约,各区域、民族间诗歌文化的交流、互动、促进的可能性也日益加强。近20年来,各民族诗人不断跨界文学与诗歌的传统媒体,也活跃于大量诗歌网站、网刊、QQ、博客、微博等阵地。2011年后迅速升温的“微信”及其延伸出来的“公众号”等平台里,亦涌现着少数民族诗人的身影。



数字化传播环境促进诗歌能够及时而广泛地传播,对文学阅读与评判的相对闭塞和单调局面有明显打破,这也意味着诗歌创作能够便捷地进入共享的传播视域,同时诗人、文本、观念等一旦现身,便都归入到一个更广泛的识别、评判与比较空间。而有了比较,就有可能带来自省和进步,就会在翻新中带来更新的希望和生机。当一茬茬起点高、善感多思、风格多样的少数民族诗歌写作者不断涌现,是对既有“民族文学”概念或印象的充实和更新。因此,对少数民族诗歌文化及诗人而言,“数字化”事实上也建构了一个新的“精神环境”,这无疑有助于少数民族诗歌的提档次、上台阶,有助于对汉语诗歌、外国优秀诗歌文化的科学参照和辩证吸取。

在传统媒体时代,乡土环境和民族文化记忆是少数民族诗歌创作的基本精神资源,而且常是文本主线或“中心思想”。在新世纪以来的数字化传播环境里,年轻一代的写作已非民族和地方文化的单纯线性呈现,而趋于诗歌文本建设和地域性、个人性的兼容表达。这种与时俱进的变化,与数字化传播环境有很大程度上或互为因果,尤其是年轻一代诗人大多与互联网同步成长,他们对于多种思想文化信息的吸取与消化自然而然、触类旁通,其写作自然积极应对时政环境、生存空间、生活方式、网络传播等诸种变化。从嘎代才让、羌人六、鲁娟、何永飞、冯娜、向迅等众多少数民族青年诗人的身上可以看出,他们既坚守地方性和民族性,又不乏现代的观念和意识。

特别是“90后”诗人,他们更为自在、主动,他们的文本仿佛是将碎片般的时光印象剪裁组合成艺术化的语言蜡染,且能以文字作囊,多维地揉和传统或现代的创作元素。也就是说,时代变迁、身心位移、观念变化,并没有带来创作的断裂或脱节,数字化传播环境之益处也正在于此:它并非抛弃了传统,而是在其基础之上的创新,它也没有扩大各类文化的差异,而是在其基础之上重新进行融合。

少数民族诗歌民族性的新变

从表面上看,数字化传播环境会带来少数民族诗歌

民族性淡化、乡土性的疏远等变化,但是,“民族性”是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基因,其传承与坚守本身就与变化互补,就有诸多表现形式,就诗歌而言,更应将其视为一种内在的精神密码。传统之所以成为传统,通常需要鲜活流动,凡是先进的可以拿来吸收,同时发扬自我的优点,坚持和更新本土文化的特色与优良传统,二者可以相互补充。

虽然数字化环境会在一定程度上抹平诸多往昔的民族文化与文学的“差异性”,但却又可能在打破凝固与孤岛化的同时,造就和更新着“民族性”。如今,种种外部环境变化、物质条件更新对于所有的诗人、所有的写作都是共享的,对于少数民族文学与诗歌及“民族性”内涵,数字化环境及其作用力则更具“推陈出新”的意味。2000年以来,5届鲁迅文学奖共有2位少数民族诗人获诗歌奖,约有20余位、10余个民族的诗人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奖项当然只是一种参照,但从中可以略见少

数民族诗歌之群体的联袂呈现与个体的脱颖而出的景象,亦可观老中青多代作者的并进。而在网络传播时空里,我们亦能欣慰地看到,各民族诗歌创作个体在历史与现时的融合中,在对民族文化的多彩枝叶和民族精神别开生面的新一轮整合中,努力于艺术表达和审美观念的更新,“民族性”在错综复杂又错落有致的多声部共鸣里递进式呈现,这种从容、多样化的可喜势头已然清晰。

除了中国古典传统、西方诗歌传统,对于诸多少数民族诗人以及栖居于少数民族地区的诗人而言,还拥有包括本民族文化积淀、地方文化资源在内的“少数民族诗歌传统”,这一传统当然是层积的积极的整合的结果,并非一成不变。在数字化环境里,我们已能看到,少数民族青年诗人正在变道而行,他们不在意“民族性”的表层复述,以及对外在风情风俗风物的简单描写,关于“民族性”的表达渐呈“复合”状态。

数字化传播环境加速了各民族诗歌的“复合”转化。这种转化首先发生在“内部”。在各民族栖居的环境里,各民族生活方式、风俗习惯虽有异,但在相似的生存生活环境以及历史背景中,会出现基于“地理共同体”而成型的“文化共同体”,在写作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精神关系。比如江南文化、草原文化等等,一个融自然山水、历史人文为一体的“文化区间”,成为了诗歌创作的巨大背景。

“少数民族诗歌传统”并非只限定或落实于“少数民族诗人”本身,“民族性”可存在于各群体、个体,也可呈现于面积不一的地理板块,以及非少数民族的写作表达里,如沈苇、于坚、海男等就有对于沙海新疆、七彩云南等地各民族文化的诗意描绘。再比如,贵州是多民族山地文化共生区,共同的史地背景、共有的精神家园、共享的区域文化资源,使贵州的作家和诗人,无论是少数民族民族,在创作中均带有边缘“身份”或“少数民族”意识,也让他们的诗与思不同程度地映现出“地理共同体”基础上的“贵州意味”,如乡土抒情、民族文化意味、山地情结等。

在数字化传播环境里,关于民族性的思考,不可能仅仅局限于一隅之内,而是要放在整体的文化语境之中。事